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年4月13日 星期六

责编：汪灵犀 邮箱：hwbzpj@163.com

说台湾

台湾的个体书店很小，营业额也不见多少，但它们已经成为街头巷尾、田园村庄中最具创意与人文关怀的书香角落，是城乡的“文化客厅”。它们所完成的不只是买卖，更是一种文化与生活的对话，也彰显了书店的美好价值。

台湾个体书店向社区化转型

打造城乡“文化客厅”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台湾个体书店虽然处境艰难，但在抵挡互联网冲击、运营成本压力的过程中，成功维系着社区内独特的文化气息，将知识和创意以更短的距离、更直接的方式，呈现给每一个市民、每一个家庭。

很小，但很独特

近10年来，台湾实体书店的日子不好过。全盛时期，台湾曾拥有3000多家大大小小的书店，到2012年剩不到1000家。走一趟昔日有“书店街”称号的台北重庆南路，便可有切身感受。在一片萧条之下，还在努力坚守的，是街角巷边各式各样充满特色的个体书店。

不像连锁书店拥有大空间和华丽摆设，从个体书店推门而入，会发现里面书不会很多，甚至很多还是旧的，店里可能还搭配卖些咖啡、文具，甚至是香精香油、猫粮狗粮，它可能是清新的、前卫的、古朴的、悬疑的。在这里，你可以欣赏，也可以融入，与它进行一次灵魂对话。

比如藏身于新北市永和区热闹喧哗的菜市场旁的“小小书店”，就像一个“气质文艺青年”。它是当地社区艺文活动与资讯交流的推广平台，除了文学读书会、写作课程、手工创意课程外，这里还会不定期举办各式议题座谈、纪录片播映、书友会等分享活动，并孵化当地社区刊物的诞生。

还比如位于台东市汉阳南路的“晃晃二手书店”，则像一个“歇脚的背包客”。它是一栋集书店、咖啡馆、民宿于一身的三层小楼，因为向游客提供“以二手书换宿”和“以工换宿”服务，成为天南地北过客与当地社区民众相互交流的一个小型聚会所。店主人罗素素曾自剖心迹说道：“开二手书店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只是想做些有趣的事。”

▲ 位于新北市的“小小书店”，就像一个“气质文艺青年”。（资料图片）

有书，更有生活

个体书店的存在，不单只是卖书，更是一种社区生活方式。书店不仅仅是提供图书和阅读的空间，更是文化体验和社交的空间，它就像城乡中的一间“文化客厅”。

“为什么要坚持实体书店？如果书店只是一个买卖书籍的地方，那它的确会很快就被市场淘汰了。”台湾个体书店文化协会秘书长廖英良说，个体书店除了作为一个营业场所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功能。“我们希望这些书店里发展出来的文化，能够被保留下来。而通过书店这个空间产生的社区文化，正是网络上无法产生的东西。”

个体书店与传统书店，大不相同。“读者走进书店，以前就是去买书，而现在却不一样。也许是想去买书、看书、搜集资料，也许只是想去喝咖啡、看展览、听讲座。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可能与书店发生关联，书店正在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廖英良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台湾托儿资源紧缺，但父母又不能把年幼的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许多书店兼具“社区托儿”功能，孩子放学后先在书店等父母，父母接孩子时也会顺道看书、购书，书店由此创造新的价值，得到新的商机。

开在新北市一间老房子里的“书房味道”，也是一个小型社区文化中心。里面卖书、卖杂货、卖茶叶、卖器物，附近居民去店里看书、挑选货品，也喝茶、喝咖啡，大家分享各自的旅游、生活经验，品味每一个生命故事背后的内在心光，和谐的新人际网络关系由此诞生。

▲ 个体书店“书房味道”里面卖书、卖杂货、卖茶叶、卖器物，是一个小型社区文化中心。（资料图片）

是守，也是种子

“书店在网络时代里似乎已经是夕阳余晖。但是，我们依然看到许多人愿意守着这一亩田，继续耕耘阅读的种子。”台湾个体书店文化协会理事长陈隆昊这样写道。

守住个体书店，俨然守住生长于台湾街巷间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种子”。无奈，在台湾部分偏远乡镇，受网络冲击，甚至连一家兼卖图书的文具店都不存在。因此，台湾文化部门将实体书店纳入“补助办理文学阅读推广作业要点”补助对象，帮助个体书店转型成为社区文化中心。从2013年开始，共有10多家书店获得50万元新台币的补助，一些资讯特别匮乏的乡镇地区，因此拥有了温馨的个体书店。

台湾个体书店文化协会也在试图推动书店的社会角色转换。“不应当仅仅把书店当做一个营业场所，还应看做是一个文化事业。我们在想办法推展，让一些个体书店尽量开到乡村去，让那里的人们可以就近走进书店，获得文化的滋养。”陈隆昊说。

香港把握『一带一路』机遇

声音

自2017年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一带一路”委员会两年来，成果丰硕。贸发局主席罗康瑞日前出席媒体茶叙时表示，他对于相关项目逐步落实感到高兴，今后还将继续积极推广“一带一路”倡议，巩固和发挥香港在融资、基建、供应链管理、风险管理及争议调解方面的优势。现将其发言摘编如下：

香港贸发局致力巩固香港作为“一带一路”环球商业枢纽的角色，将继续依循制定路线图、建立联盟、构建沟通合作平台、缔造商机、促成合作项目5大方向，把握“一带一路”机遇。

在制定路线图方面，香港贸发局成立了“一带一路”委员会，推动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调研工作，全年刊登约2500份电子及印刷版研究文章；通过“一带一路”资讯网站提供相关资讯，现有累计840万多人浏览。

在建立联盟方面，香港贸发局2017年成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现共有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的121个成员机构，会员总数超过500万。

在建立沟通合作平台方面，2019年香港贸发局将举办第四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论坛将扩展至两天。

在缔造商机方面，香港贸发局将举办商贸代表团及投资洽谈活动，带领香港专业服务及内地企业代表访问东盟、中东、非洲等地，了解当地机遇，促成商贸合作；丰富“一带一路”资讯网站内容，扩大投资项目及香港服务供应商资料库规模，增设“中小企锦囊”及“一带一路基建锦囊”。

在促成合作项目方面，香港贸发局会在展览会中加强商贸投资配对环节，为更多港商找到新客户、新市场；为企业提供网站咨询配对服务；组织商贸代表团探访内地省市，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

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推广项目，促进香港、内地及国际合作，推动香港服务、金融及法律平台参与“一带一路”发展，为国际公司以至中小企业开拓环球商机。

一周热词

社 会 公 义

非法“占中”过去4年多，香港市民终于等来审判幕后黑手的这一天。日前，香港法院对“占中”主要搞手戴耀廷等9人进行宣判，每人都有一两项罪名成立。有香港媒体感慨，裁决或许来得有些晚，但正义不会缺席。

当年持续了79天的非法“占中”严重地冲击了香港法治，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对香港特区公众的正常生活秩序都带来了严重损害。非法“占中”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的宪制基础，冲击港人尊重法治的核心价值，动摇“一国两制”根本。如若放任自流，则将令香港在“如何维护法治”上迷失方向，引发社会裂痕，贻害无穷。

判决宣告后，香港民建联发表声明称，判决“彰显了社会公义，维护了香港法治”，同时向社会发出一个清楚信息，任何人不论其违法目的如何，只要违法就要负上法律责任。

香港是法治地区，非法“占中”的搞手们，低估了特区政府的执法决心。法院的裁决划出了红线：违法者要面对法律后果，无论是谁也一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雷 蕾）

看香港

寻访香港抗战老兵

闵 捷 洪雪华

香港西贡斩竹湾，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烈士碑园坐落在面朝大海的山岗上，20米高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抗日英烈纪念碑”7个大字。在日军侵占香港的3年零8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的战士们参与营救南下文人，为抗战出生入死。

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后院，十余平方米的房间里，挂满了红色锦旗，这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们的“荣誉簿”。1998年成立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便位于此处。

84岁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会长林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回忆起当年的“黑色圣诞节”。1941年12月初，香港充满了节日气氛，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放上了“圣诞老人”。8日清晨，港岛东北角突然传来了飞机呼啸声，伴随着空袭警报声。“我和母亲正在去教堂的路上，飞机从头上飞过，我们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

日军进攻香港次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立即派遣精干武装进入香港抗日。5天内，日军占领了整个新界和九龙半岛。25日下午6时，香港总督府挂起白旗，短短18天，香港宣告沦陷，开始了3年零8个月的“黑暗岁月”。

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包括沙头角、西贡、大屿山、港岛等中队及海上中队和国际情报组，成为香港的抗日力量。

1943年12月，8岁的林珍成为港九独立大队的“小鬼”通讯员，利用年纪小不易被察觉的优势，在游击队之间传送情报。“情报写在很细小的纸条中，卷起来跟火柴棒差不多大。送信途中会爬山，经过小溪和沙滩。幸运的是，没有遇到日军。”

1940年，大批文化界人士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积极开展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紧急配合香港地下党组织营救文化界人士。

著名作家茅盾也在营救名单中。据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记载，他们一行人翻过大帽山离开香港。“我们终于登上了梅林坳，俯视山下，在茂盛的树木中，隐约可见几点灯火。”那就是白石龙——游击队总部所在地，终于安全了！有千把文化人，在香港地下工作者的安排和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逃离香港抵达内地，这是一次伟大的营救行动。

沙头角罗家大屋是游击队进入香港后的落脚点，也曾是港九独立大队的活动基地和交通站。数十载岁月沧桑，老屋外墙已斑斑驳驳，院子里一簇簇的三角梅开得正盛。2018年2月，为了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和香港居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决定在沙头角罗家大屋设立抗战纪念馆。

94岁的老兵徐墀在这里回忆起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情景。“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后，奔走相告，欢呼高歌。”

完成抗战使命的东江纵队随之北撤，老兵黄清也在其中。“我原本计划去山东，但因病留在香港，后来在西贡当警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目前，港九独立大队健在的抗战老兵超过100人，分别居住在香港、广州、深圳、惠州、佛山和北京等地。最多时达千人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如今在香港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的老兵仅剩下58位。

从1985年起，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人开始整理香港抗战历史。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115名烈士名单放进香港大会堂，供市民瞻仰。而昔日的抗战英魂也长眠于西湾和赤柱等地。

香港历史学者邱逸用了两年时间写下《战斗在香港》，书中讲述了8名港九独立大队普通战士的人生轨迹。导演刘深通过寻访50多位抗战老兵，拍摄了纪录片《香港大沦陷》，纪念老战士们的英雄事迹。

“在年轻人记忆中，这段历史几乎是空白的，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走出课堂，了解和感受这段历史。”邱逸说。

题图：94岁的老兵徐墀在回忆抗战情景。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